

2017年度黑龙江省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助项目

大学英语跨文化教学中的 问题与对策

陈桂琴 著



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2017 年度黑龙江省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助项目

大学英语跨文化教学中的 问题与对策

DAXUE YINGYU KUAWENHUA JIAOXUE ZHONG DE
WENTI YU DUICE

陈桂琴 著



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内 容 简 介

为了真实再现大学英语跨文化教学现状,摸清大学英语跨文化教学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及其根源,以便有针对性地分析研究和采取策略,改革大学英语教学,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本书综合跨文化交际、外语教学、应用语言学等理论的研究成果,以跨文化交际能力三分模式为理论框架,采取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进行了实证研究。本书阐述了语言、文化与交际三位一体的关系,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策略进行了深入探讨,构建了包括认知、情感、行为三个层面内容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体系。本书明确了大学英语跨文化教学必须处理好本土文化与英语文化、英语功用性与人文性、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之间的关系;提出一系列有效策略帮助学生树立语言、文化平等观,消除“中国文化失语症”的影响,树立跨文化自觉意识,达到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目的,从而解决跨文化教学中的实际问题。本书明确指出大学英语教学应以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为目标,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只有通过跨文化教学才能得以实现。

本书适用于跨文化交际专家、学者、教师及爱好者使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学英语跨文化教学中的问题与对策/陈桂琴著.
—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17.11
ISBN 978-7-5603-7039-2

I. ①大… II. ①陈… III. ①英语-教学研究-
高等学校 IV. ①H319.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74998号

策划编辑 甄森森
责任编辑 陈洁
出版发行 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
社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复华四道街10号 邮编 150006
传真 0451-86414749
网址 <http://hitpress.hit.edu.cn>
印刷 哈尔滨圣铂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960mm 1/16 印张 15.25 字数 266千字
版次 2017年11月第1版 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603-7039-2
定 价 49.80元

(如因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我社负责调换)

前 言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文化多元化的快速发展,英语作为世界通用语的地位确立,这为我国大学英语教学培养具有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高素质人才提出新要求。然而,我国大学英语教学实际却是长期延袭传统的以语言知识体系为中心的教学模式,注重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并没有给予文化教学和文化学习以足够的重视,严重影响了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提高,致使学了多年英语的学生不知如何用英语交流,更谈不上跨文化交际。

最新《大学英语教学指南》明确指出,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增强跨文化交际意识和交际能力。为了真实再现大学英语跨文化教学现状,摸清大学英语跨文化教学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及其根源,以便有针对性地分析研究和采取策略,改革大学英语教学,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本书综合跨文化交际、外语教学、应用语言文化学等理论的研究成果,以跨文化交际能力三分模式为理论框架,采取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阐述了语言、文化与交际三位一体的关系,明确指出大学英语教学应以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为目标,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只有通过跨文化教学才能得以实现。

本书针对笔者从教多年的大学英语跨文化教学,采取问卷调查和教师访谈的形式,从认知、情感和行为三个层面调查了解和深入剖析跨文化外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

问卷数据统计结果表明,学生文化学习与运用情况不够理想,存在严重的“中国文化失语”现象,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普遍很低。影响学生英语文化知识学习的主要因素有:学生对文化的定义和认识、学生对语言学习与文化学习的观点和看法、英语课堂教学与学生文化信息来源情况、学生在英语学习中精力分配情况,其中学生对语言学习与文化学习的观点和看法对学生英语文化知识学习的影响最大。影响教师跨文化教学情况的主要因素有:教师对跨文化交际知识教学的态度、教师对跨文化教学内容的认识、跨文化教学方法的选择、教材中文化内容的含量、文化教学时间的分配、学生对文化学习的兴趣或态度,其

中跨文化教学方法的选择对教师跨文化教学情况的影响最大。

本书通过对问卷调查和访谈结果进行分析研究,进一步发现大学英语跨文化教学在教学理论、教学目标、教师自身跨文化综合素养、教师对跨文化教学的认识与教学实践、教材文化内容呈现等方面存在严重问题;学生作为学习的主体存在着学习目标不明、对文化学习看法模糊、自主学习能力不强等问题。针对存在的问题,本书从外语教学和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两个层面对问题的成因进行了深入剖析,发现教学理念模糊、教学目标不明确、文化内容欠缺、教学环境不足、应试教育影响以及中西文化差异、中西思维方式的不同、中西方价值观差异的影响等是引发问题存在的根本原因。

本书的创新之处在于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针对跨文化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根源,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策略进行了深入探讨,构建了包括认知、情感、行为三个层面内容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体系。体系明确了大学英语跨文化教学必须处理好本土文化与英语文化、英语功用性与人文性、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之间的关系;提出一系列有效策略帮助学生树立语言、文化平等观,消除“中国文化失语症”的影响,树立跨文化自觉意识,达到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目的,从而解决跨文化教学中的实际问题。

本书融语言教学与跨文化教学于一体,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深入挖掘跨文化教学存在的问题及其根源,具有较强的系统性和可针对性。研究选取的学校是众多中国高校的一个缩影,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中国高校跨文化外语教学的状况。本书采用大量图表作为论证的依据,其数据均来自问卷调查与访谈,真实可靠且直观性强。本书语言简明清晰,注重启发性,对改进教学方法、开阔学生的思路、拓展学生的思维空间、引发学生学习的兴趣、调动学生主动探索问题、积极参与教学实践活动以探究的方式完成教学任务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将会对大学英语教学起到积极的指导作用。研究结果是对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研究的有益尝试和必要补充,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可为跨文化外语教学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实践基础和理论参考。

由于笔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不妥和疏漏之处,敬请各位专家、同行及读者批评指正。

陈桂琴

2017年11月12日

目 录

第1章 引言	1
1.1 研究的背景	1
1.2 外语文化教学国内外发展综述	6
1.3 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14
1.4 研究的问题与思路	15
1.5 研究的方法	16
1.6 论文的结构	17
第2章 研究的理论基础	19
2.1 语言、文化与交际“三位一体”	19
2.2 跨文化交际与大学英语教学	30
2.3 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	35
2.4 本章小结	43
第3章 实证研究方法与设计	44
3.1 引语	44
3.2 跨文化教学问卷调查	44
3.3 跨文化教学教师访谈	76
3.4 本章小结	80
第4章 研究发现:大学英语跨文化教学中的问题及其成因	82
4.1 跨文化交流背景下我国大学英语教学的现状	82
4.2 大学英语跨文化教学中的问题	85
4.3 大学英语跨文化教学问题成因分析	107
4.4 本章小结	117
第5章 大学英语跨文化教学策略研究: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体系构建	118
5.1 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认知体系	119
5.2 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情感体系	129
5.3 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行为体系	140
5.4 本章小结	158

第6章 结语	159
6.1 本书的主要内容	159
6.2 本书的主要发现	160
6.3 研究结论和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体系的构建	162
6.4 存在的不足以及今后研究的方向	164
附录	166
附录1	166
附录2	170
附录3	175
附录4	185
附录5	195
附录6	196
附录7	197
附录8	202
附录9	208
参考文献	221

第 1 章 引 言

1.1 研究的背景

当今世界,国际交流与合作越来越频繁,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已成为这个时代的特征。不管你愿意与否,几乎谁都无法避免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进行交往,跨文化交流正在成为越来越普遍的日常现象。

这就使得英语成为全球通用的语言,即当今世界的“普通话”,是不同国家与文化群体间交流使用最普遍的语言,其作用愈发凸显。然而,文化间的差异往往会给跨文化交际带来意想不到的困难与问题,误解、困惑、矛盾,甚至冲突时有发生。来自不同文化群体的人们能否共处共存,共同解决文化冲突的一系列问题,共谋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之间能否有效地进行交往并逐步做到相互理解。因此,如何运用英语进行跨文化交流不仅关系到个人的发展而且还与国家的综合实力密切相关。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国内对英语的需求增多了,对英语教学的要求也提高了;在新形势下,原有的英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与弊端也就逐渐显露出来。因此,在世纪之交中国兴起了不同层次英语教学改革的风潮,改革的目的在于提高英语学习者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使英语成为21世纪公民的基本素养之一。

在竞争日趋激烈的21世纪,各国之间的合作愈加紧密,高度知识化、高度信息化的特征愈发凸显。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大局,使我国社会的各个领域面临更加巨大的挑战和难得的发展机遇,对外语人才培养有了更高的期望,对高等外语教育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样的新形势下,只有培养新型外语人才才能适应当今社会的需要,探索新的外语教学法才更有助于培养社会所需的外语人才(杨路晴等,2010)。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英语在中国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于是在21世纪之交我国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如国家新课程改革、英语专业培养目标的变革以及

大学英语的改革等,以适应全球化趋势和我国社会经济迅猛发展的需求。在全球化背景下,在高校进行英语教学求变求新的过程中,培养跨文化意识,发展跨文化交际能力,学会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交往,对于年轻学子尤为重要。外语教学肩负的社会历史责任就是要培养和增强学生的跨文化敏感性与自觉性,使学生开阔心胸、开放头脑,从更广阔的视野,以更灵活和富有创造性的方式与自己有着不同文化取向的人们进行交往。

1.1.1 全球化背景下国际通用语英语的战略地位给英语教学带来的挑战

跨国贸易的发展、信息技术的革新等因素共同促成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从2000年起,随着我国奥运会和世界博览会的连续申办成功,尤其是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实际上进入了一个全球化时代。全球化有其狭义和广义的定义。通常而言,经济学家往往狭义地把全球化定义为全球经济的一体化,主要指商品、服务、资本、技术(知识)等的跨国流动。而一般人倾向于从广义的角度来理解全球化,它不仅仅表现为经济的全球化,还表现为政治、文化、环境等领域的全球化。全球化不仅改变着世界经济格局,而且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文化模式。全球化加强了不同国家的联系与合作,同时也为各种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念和社会结构提供了交流平台(陈雪芬,2011)。

从语言接触的角度来看,“不管全球化造成了其他什么结果,语言集团之间的更多接触是这一现象的重要结果”(Wright S.,2004)。毫无疑问,全球化使国际交流不断增强,语言接触更加频繁。而语言的全球化(即产生一种全球通用的语言)成为全球化趋势中的一个主要结果。

所有语言中,英语担当了这个极其重要的媒介体。这是因为英语不是普通的外语,而是全球通用语言,“世界上绝大多数的科学、商业、经济和技术知识都是用英语写成和发表的”(Richards,2001)。“全世界1/5的人具有不同程度的英语交际能力,全世界2/3的科学家能读懂英文,全世界80%的电子信公用英语存储,全世界网站的78%为英语网站”(姜亚军,2002)。国际上80%以上的科技论文首先用英文发表,一半以上的学术刊物语言是英语,85%的长途电话用英语进行,75%的传真、电报和电子邮件采用英语。在许多政治家和国家看来,英语不再只是交流的工具,它更是一个国家的国力、国际竞争力得以提升的重要手段(蔡基刚,2012)。英语已经成为全球通用语,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英语这个国际通用语起到了将不同地区、不同语言的人们在经济等方面联

系起来的作用。韩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极力推进“迎接21世纪的教育改革”,主要是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课程经验并对传统的外语课程进行改革,以适应全球化挑战(余玉娴,2008)。韩国前总统金大中曾经告诫他的国民,不掌握网络通用语言,要想在国际竞争中获取胜利是绝对不可能的(姜亚军,2002)。为了培养在21世纪全球一体化背景下具有多元语言文化和国际竞争力的人才,韩国多次调整了外语教学政策,加大对外语教学的投入,把外语教学放到战略发展的高度。韩国人把经济视为第一经济,教育视为第二经济,而外语教学是第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王克非,2011)。

尽管英语是印度官方语言,但是进入全球化时代后,印度政府对英语更为重视。印度的大学生及科技人员的英语能力为其培养国际人才带来了极大优势。到目前为止,印度已先后多次获得多项诺贝尔奖,包括文学奖、物理学奖、医学奖、经济学奖及和平奖等,这与他们杰出的英语水平不无关系。这些获奖者不仅能用英文撰写学术报告、著书立说和进行文学创作,还能够熟练地使用英语发表演说和答记者问。在科技领域,印度人的表现令人瞩目,印度工学院的毕业生在美国非常受欢迎。在文化领域,印度也涌现了一批能融会东西方文化的杰出人才。另外,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许多印度人或担任国际组织的高级官员,或被推举为报告员、书记员(尹洪山,2005)。

早在1985年,英语世界化理论的开拓者Braj Behari Kachru(1985)提出了用“三个同心圈理论”来解释英语传播的过程。“三个同心圈”理论将英语的覆盖人群分为内圈、外圈和延伸圈三个同心圈。内圈人口最少,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和地区有18个,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和几个加勒比海国家,母语使用者用英语满足其全部交际需要,获取方式是自然习得。外圈人口比内圈多,英语是第二语言(官方语言)的国家超过70个,主要由英语国家的前殖民地组成,包括尼日利亚、加纳、印度和新加坡等国。官方语言使用者在国内交流中对英语有一定的依赖性,因为在他们的社会里,英语是司法、行政、教育、科学研究等领域的专用语言,获取的方式是学校教育。延伸圈人口最多,把英语作为学校外语课程的国家有100多个,包括中国、日本、韩国等。英语的功能是在科技、教育、工业、贸易和外交等领域起辅助语言的作用,获取方式是长期的学校教育(颜治强,2002)。

随着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英语教育越来越受到全世界的关注和重视。英语延伸圈国家如亚洲的韩国、日本等,以及欧洲的欧盟等国不仅采取学习英语年龄提前、学校课时增加等方式以提高本国国民的英语水平,而且把英语看作提高国际竞争力、适应全球化经济发展、促进民族之间相互理解融合、提高国际

意识的重要素养之一。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尤其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人较以往更加重视英语学习。一方面出于迫切地希望学习外国文化与科学知识、获取世界各方面信息的需要,另一方面是中国希望把本国的传统文化和科学技术推广到世界从而影响整个世界。因此,自改革开放以来,英语学习的热潮持续不断。根据在上海举行的“第二届中国外语教学法国际研讨会”的最新统计,中国约有三亿人口学习英语(专业和非专业),其中大、中、小学学习英语人数超过一亿。从2000年开始,作为世界英语学习大国的中国把英语教育提升到21世纪公民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英语不仅是国民教育体系的必修课程(从义务教育阶段开始一直到博士生阶段),而且受到非国民体系教育机构的重视(目前如新东方英语、英孚等各种形式的成人英语培训或少儿英语培训等也十分火热)。中国虽然处于英语延伸圈,但是其英语学习人口之多、范围之广是举世瞩目的,其对英语全球化产生的影响也必然是巨大的(陈雪芬,2011)。

针对如此庞大的英语学习队伍,师资队伍配备如何?学习效果怎样?这确实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是外语教学所面临的巨大挑战!

1.1.2 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对外语人才的需要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我国虽已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但对外交流仍比较少,整个社会仍处于一个相对半封闭的状态。学生学习英语不过是把英语作为高等学校的一门普通课程,或是出于兴趣爱好,培养自身的素质修养;学得好坏,效果如何,往往只用能否通过英语四、六级考试来衡量。

就教学目的而言,传统的英语教学主要是为了培养学习者用目的语进行阅读和与来自目的语群体的人们进行交际的能力,以目的语为母语的人们的语言能力(native speaker language competence)是外语教师和学生力求达到的标准。鉴于语言与文化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传统的外语教学也包含一定意义的文化教学,其内容基本上也是以目的语群体的文化为主。例如中国各个大学英语专业都开设英美概况等文化课程,目的是为英语的学习,特别是为英美文学阅读和欣赏,扫清背景知识上的障碍。传统英语教学的这种一切以目的语群体为标准的做法,在世界经济和教育全球化不断深入、文化交往日益频繁的21世纪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

随着中国经济加入到全球化进程当中,我们与世界各国的交往与日俱增,中国在世界经济和政治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个时期的大学英语教学必然要出现根本性的变化。英语不再只是一门课程而已,而是事关国力

能否提升、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与作用如何的关键所在(蔡基刚,2012)。

国际交流活动的广泛开展,意味着跨文化交流的深入。从事跨国科技与商务活动必须了解和掌握不同文化之间的联系与差异,只有积极地面对这种现状才能实现预期目标。可见,国际交流活动就是跨文化交际活动,能否妥善处理文化差异和冲突对于国际交流活动的有效开展至关重要。跨文化交际能力是21世纪多元文化社会中专业人士应当具备的基本素质之一。我国在参与国际竞争中需要一大批不但通晓国际经济规则和全球思维的人才,而且还需要具有跨文化能力的人才(杨路晴等,2010)。高等学校必须注重培养大学生具有国际意识、理解不同国家与民族的文化、熟练运用外语以承担国际交流的时代重任(李早霞,2012)。因此,加强对学生的大学英语(本书主要是指非英语专业)教学以及提高学生的英语文化素养就成为高校的一项重要的教学任务。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真正融入世界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的全球化体系,积极参加国际合作和国际竞争,以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外语交际能力日益凸显出重要性。正如曾葡初曾说过,外语教学与社会发展之间关系密切,社会发展会促进外语教学的进步;反之,外语教学也在社会的发展进程中产生积极的作用。外语教学实质上是国际事业,这一认识在全球化过程中日益清晰。外语教学的目的是提高人的综合素质,学好外语是为了实现国与国之间的交流和合作。

由于各种主客观、内外在因素的综合作用,跨文化交际在当今世界蓬勃发展,已经朝向民族文化趋同以及全球文化认同的方向发展,这一现象被称为“全球文化一体化”或“文化全球化”。文化的交流说到底思想的交流,因为一切文化归根结底都是人类思维的成果。因此,要研究探讨不同民族的文化中的最深层即思维模式、世界观以及价值观的差异,就必须研究不同民族的语言差异。地球越变越小,整个世界犹如一个“地球村”,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是这个村里往来密切的村民。但需要注意的是,“村民”之间一方面进行正常、友好、和睦的交往,另一方面也存在种种不和谐的音符,突出表现为不同民族、不同国家间的文化冲突、民族冲突,甚至政治,经济冲突。

为了人类自身的和谐发展,为了全球各民族的和睦共处和合作共赢,就必须解决这些冲突。而加强不同民族间的了解,认同和沟通是解决这类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

想有效地进行跨文化交际,以此增强不同国家之间、不同民族之间的友好往来与和睦相处,达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目的,就必须处理好彼此之间的政治、经济和外交关系。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要了解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存在于表

层结构和深层结构的文化传统,以便在跨文化交际中消除民族隔阂和文化误解。

随着全球化、多元化的加速发展,国与国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跨文化”已成为时代的代名词,文化冲突时有发生,特定文化的交际能力已不能满足时代的需求,提高人们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已成当务之急,这就是为什么要进行跨文化语言教学的原因,也就是说在教学过程中既要重视交际的得体性、有效性,又要注重语法、语音、用词等方面的准确性,做到“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并重”(肖仕琼,2010)。

只有研究、了解和掌握不同民族在文化方面和语言方面的基本特征与差异,我们才有可能成功地进行跨文化交际,并由此促进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友好交往和和睦相处,从而有利于全世界、全人类的和平发展,有利于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构建。

1.2 外语文化教学国内外发展综述

外语教学的目的就是培养跨文化交际的人才。在世界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今天,人才的跨文化意识与能力培养的重要性日益凸现,外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中外学者为此进行了多方面探讨和研究,各国文化教学发展呈不均衡态势。在我国,尽管人们的认识有所提高,但具体实施和成效远不如人意。

1.2.1 美国外语文化教学研究

20世纪60年代,美国人开始关注文化教学,分别于1953年、1960年、1972年和1988年召开以文化教学为主题的研讨会,就文化教学对外语教学和外语学习者的重要意义达成了共识。研讨会不但强调了文化教学的复杂性,而且还强调了文化教学的多面性,着重研讨了语言和文化如何在课堂教学中有机结合的问题。

Lado(1957)提出的有关文化对比的框架,既能帮助教师提前了解文化学习的难点,又能使学生的本族文化意识得以提升。但他只考虑了暴露在外、易于观察的行为层面,而没有对相关重要的文化成分如价值观、世界观等进行对比分析。

Hall的三部经典作品:*The Silent Language*(1959),*The Hidden Dimension*(1966),*Beyond Culture*(1976)从不同视角对文化教学的必要性进行了全面、具

体、生动的论证,以翔实的资料为文化教学的实施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Brooks (1968)认为文化具有两个层面,即形式文化(formal culture)和深层文化(deep culture),二者的区别可以从文化主体能否意识到或观察到文化的作用来判断。虽然,Brooks对两个层面的文化定义相当模糊,但其文化定义比较全面,而且考虑了外语教学的需要。Brooks还强调外语教学的整个过程都应包含文化教学,并且在不同阶段确定不同的教学重点和教学方法。

Nostrand(1974)提出“Emergent Model”文化分析模式。他确定共有32项主要内容和特征构成社会文化系统,并将其归纳为四大子系统。这一模式全面、透彻地分析了文化所包含的内容,并将本来杂乱无章、难以把握的文化内容进行梳理和分类,有利于人们更清楚地认识文化,并控制和操作外语教学中的文化内容。

在Nostrand的文化分析模式的基础上,Seelye(1993)确定了文化学习的总体目标和另外7项子目标,并介绍了文化教学中所使用的一些方法,如文化包(culture capsules),文化链(culture clusters)和文化同化(culture assimilators),而且还探讨了如何评价文化学习的问题,为文化教学实践指明了方向。

在Canale和Swain(1980)看来,与以往重视语法方式相比,交际方式的出现则使人们更加意识到语言和文化更加自然结合的重要性。有关外语课堂中如何进行文化教学的指导内容出现在许多教学参考书中,这说明当时人们已经把在目的语文化语境中进行交际作为外语教学的目标。

Stern(1983a)在他的重要著作中明确了社会概念(concepts of society)在语言教学中的重要地位。他(1983b)在一篇有关多维的外语课程的论文中提出一种新的课程模式,该课程模式由四部分组成,其中就包含文化教学大纲(cultural syllabus)。

随着跨文化交际学的出现和发展,许多学者(Brooks,1968;Nostrand,1974;Robinson,1988)试图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探讨和研究语言文化教学,寻求通过跨文化交际让学生了解外国文化的可行模式,以达到提高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目的。

Robinson(1988)提出了“文化敏感性”的设想,其关注的是外语学习者的“内化过程”和“心理变化”。他(1996)认为文化既存在于文化成果与文化形式(cultural products and forms)当中,也存在于文化被使用的过程之中。人们常常用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念和社会规范与交际对象在各种社会场合进行协商。因此,外语教学不仅要文化知识传授给学生,更重要的是要帮助学生利用语言和文化进行意义创造和协商,达成相互理解。学生需要有机会进行文化调查研

究的练习(ethnographic practice),来修改他们对其他文化群体消极负面的感知,促进正面印象的形成。

Kramersch(1993)倡导多元文化互动模式的语言文化教学,突破了过去单纯的外语“文化导入”式的教学,使母语和目的语并重,形成“双向互动”,纠正了以往“重文化教学内容、轻文化教学过程”的现象。

Kramersch(1993)指出要达到跨文化交际和跨文化理解的目的,就必须使学生既能理解文化事实,又能从认知、情感和行为等多个方面去理解和感受目的语文化的特点。她提出了实现跨文化理解的四个步骤。

- (1)了解目的文化如何表达和理解某一文本。
- (2)反思本族文化如何表达和理解同一文本。
- (3)分析本族文化和目的文化相互之间如何理解。
- (4)进行跨文化对话,实现跨文化理解。

跨文化理解的核心在于:文化环境的不同使我们有多种不同的方式进行听、说、读、写和看待世界,为了实现跨文化理解,我们必须首先了解和理解目的文化和本族文化,对两者的异同加以比较,以圈内人和局外人两种视角理解相关文化现象,也就是说要以跨文化的视角看待文化(Kramersch,1993)。

这一思想使人们不再担心外国文化学习会影响学习者对其本族文化的态度和掌握,对如何组织和实施文化教学、如何使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相结合起到重要的指导意义。

以促进语言教学中的文化教学为中心任务的美国语言教学研究机构CARLA(Center for Advanced Research on Language Acquisition)于1994年11月和1996年5月召开了两次主题为“以文化为核心进行语言课程改革”的研讨会。会议论文集*Culture as the Core: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Culture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the Second Language Curriculum*和*Culture as the Core: Integrating Culture into the Language Curriculum*分别于1998年和1999年出版。

这两次研讨会的成就和贡献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总结了过去几十年来文化教学研究的成果,从文化教学环境、教师和学生的作用、教学材料、教学评估与测试等侧面理清了思路,形成了文化教学的理论框架(Paige, Jorstad, et al, 1999)。

(2)从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跨文化交际学、文化人类学等视角,探讨了文化教学内容和方法等关键问题,为文化教学实践奠定了理论基础(Saville Troike, 1998; Damen, 1998; Smith et al, 1998; Lafayette, 1998)。

(3)分析了新的外语教学文化标准及其对外语教学研究和实践的启示,为

将来的文化教学研究和实践指明了方向(Lange, 1999)。

(4)探讨了文化学习的过程以及文化与语言结合的途径,确定了文化在外语教学中的核心地位,促进了外语教学改革。

1996年,美国教育部颁布了改革后的外语教学标准。这一新标准明确规定了文化是外语教学的基本核心(Lange, 1999)。新的外语教学大纲以国家文件的形式认可和巩固了文化教学的作用和地位,使文化教学得以普及和深化。文化教学与跨文化交际培训相互沟通、有机结合,大大提高了学生学习外语的积极性,改善了美国年轻一代的大国沙文主义思想和唯我独尊的思想倾向。

进入21世纪后,专家学者对语言文化教学的研究使文化教学内容和方法进一步得到扩展。

Starkey(2002)指出,语言文化教学应重视人权教育,应把道德层面的教育包含其中。Guiherme(2002)认为人权教育与民主教育有利于提高文化意识。Patrick(2004)倡导通过体验性语言教学加强文化学习与教学,其内容涉及文化内涵、学生介入活动、预期或实现的结果、学习内容和师生之间形成的关联实质五个方面(Moran, P. R., 2004)。

美国语言文化教学研究的蓬勃发展进一步深刻印证了人们对语言文化教学的认知,正如Claire Kramersch(2005)所言,文化界定了语言本身的内容和形式,不了解语言形成的文化背景,灵活运用语言的结果就难以实现。拥有相关语言的文化知识和文化意识能使语言运用更加熟练和得体,因此文化教学不是可有可无的技能,而是语言教学的核心。

1.2.2 欧洲外语文化教学研究

法国教育家F. Gouin在1880年发表著作《语言教学与学习的艺术》中首次指出文化在语言教学中的重要作用。1918年,英国杂志《现代研究》(*Modern Studies*)发表的一篇报道第一次认识到外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重要性。

欧洲的外语教学(以德国和法国的英语教学为主要代表)受美国听说法(audiolingual method)和西欧视听法(audio-visual method)的影响,将语法结构作为教学重点,并同时开设文化课程。德国的Landeskunde、法国的Civilisation就是较早时期的文化教学课程。

英国学者Byram力图在语言文化教学模式方面有新的突破。Byram等在对欧洲各国语言文化教学进行调查的基础上,根据欧洲跨文化交际的实际需要,创建了将语言和文化相结合的综合教学模式。Byram(1994)在这个模式中对文化教学的方法、原则、内容以及评估方法进行了系统的阐述,认为以往的文化教

学倾向于重具体的知识和行为,轻理解和解释文化现象的整体能力;重事实、轻价值;重典型性、轻多元性。

1995年分别以“Intercultural Dimensions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和“Drama, Cultural Awareness and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为主题举办的研讨会(Byram and Fleming, 1998)强调了文化调查研究法是学生学习、教师教学和培训的重要方法,并探讨了戏剧、文学和表演等对于文化意识培养的作用。

1996年,欧洲公民的语言学习(language learning for European citizenship)的现代语言计划在历时6年后基本完成(Byram and Zarate, 1997)。该项研究以探讨如何提高学习者的社会文化能力及跨文化交际能力为重点。英国的Byram和法国的Zarate在20世纪80年代完成的关于文化教学的经典著作(Byram, 1989; Zarate, 1986)使文化教学得到应有的重视。

英国Michael Byram主持的“The Intercultural Dimension in Language Learning for European Citizenship”,芬兰Sade Pirkko Nissila的“Raising Cultural Awareness amo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er Trainees”,奥地利Roland Fischer的“Projects and Other Tools: Some Strategic Remarks on Intercultural Learner Competence”,瑞士Silvia Mitleregger的“Training Language Teachers in the Pedagogy of Exchanges—Towards the Development of Socio-cultural Competence”和挪威Anne-Brit Fenner的“Socio-cultural Competence in a ‘Learning to Learn’ Context”,这些讲习班涉及文化教学的各个层面,为外语教师和政策制定者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和启发。

由Durham大学教育学院和巴黎的全国教学研究院共同进行的项目“Cultural Studies/‘Civilisation’ for Advanced Language Learners”的研究目的在于对当时的文化教学进行改革。研究成果由教师和研究者以实验课的形式展现,其主要革新之处在于“借鉴了社会文化学和人种学的思想创建一个新的理论和方法,将学生自己的亲身经历作为他们学习的出发点和与他们所学文化进行比较的基础”(Byram and Morgan, 1994)。该实验课程确定了明确的文化教学原则,如循序渐进原则及授之以渔原则等,为外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参考框架。

1997年出版的两本书:*The Sociocultural and Intercultural Dimension of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Byram and Zarate)和*Sociocultural Competence in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Byram, Zarate and Neuner),全面总结归纳了1989年至1996年期间欧洲文化教学的成果,进一步强调了外语教学中社会文